

李
蕉
著

张载政治思想述论

中
華
書
局

李
蕉
著

张载政治思想述论

中
華
書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载政治思想述论/李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1.5
ISBN 978-7-101-07980-7

I. 张… II. 李… III. 张载(1020~1077) — 政治
思想 — 思想评论 IV. D092.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2793 号

书 名 张载政治思想述论

著 者 李 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¼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980-7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选题意义	2
第三节 文献综述	7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6
第五节 主要内容	17
第六节 创新之处	19
第二章 张载政治思想的产生背景	21
第一节 忧患的时代	21
第二节 佛老的盛行	31
第三节 儒学的复兴	38
第三章 张载政治思想的学理分析	45
第一节 张载政治思想的内在理路	45
第二节 张载政治思想的外在辨析	64
第四章 张载政治思想的制度考察	88
第一节 制度考察之起点:思想张力	88
第二节 制度考察之一:恢复井田	97
第三节 制度考察之二:重建封建	102
第四节 制度考察之三:推行宗法	109
第五节 张载政治制度的系统分析	121

第五章 张载政治思想的后世传承	131
第一节 张载政治思想之“不传”与“传”	131
第二节 宋代传承之代表思想	133
第三节 明清传承之代表思想	141
第四节 近代传承之代表思想:	151
第五节 后世传承对张载政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156
第六章 张载政治思想的历史价值	159
第一节 张载政治思想的实质核心:以民为本	159
第二节 “张载民本观”的历史价值之一:俯视角度的下移	161
第三节 “张载民本观”的历史价值之二:启发民心的自觉	163
第四节 “张载民本观”的历史价值之三:责任意识的培养	166
第五节 “张载民本观”的总体评价	167
第七章 结论	170
附录一:张载年谱	172
附录二:《蓝田吕氏乡约》	178
参考文献	182
后记	189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张载(1020—1077),字子厚,生于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张载和他的弟子多系陕西关中人,所以他的学派被称为“关学”。作为北宋时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张载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在哲学研究的视域之内,张载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并称“北宋五子”;他的“关学”也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和朱熹的“闽学”,并称“濂洛关闽”四大理学学派。但相对于张载的“内圣”哲学,学者对他“外王”政治思想的研究就显得门庭冷清了。

然而,在北宋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新兴的“士”阶层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而且也发展出高度的政治主体意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成为一代文人的治学动力和崇高理想,张载当然也不例外。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然,两宋士大夫几乎无不如是。”^①而张载也多次以“学政不二”^②自居。所以,在张载的整体学术理论中,关于时政议论、治国方略等方面的议题本应占据相当的比重,但笔者目前所见学界对这一部分的评价却多是负面且不重要的:张载的政治思想被基本定位为“简单的回复三代之治”,这位思想家在此方面的形象也因此显得迂腐而刻板。

于是,张载在“学”与“政”上的“一重一轻、一强一弱”,便为本文的研究引出了问题:张载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学政并重”的北宋时期是否是一个特例?

①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页。

②张载:《近思录拾遗》,《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6页。

如若不是,张载又是否做到了他那流芳千古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什么才是张载政治思想的真实面貌?本文的研究就此层层展开。

第二节 选题意义

一、学科意义:为张载研究提供政治思想的分析维度

首先,迄今对于张载哲学性的研究并未涵盖张载思想的全貌。北宋新儒学作为思想史领域研究的重镇,众多学者都醉心于此,以张载为主的关学研究也不例外。尤其是从哲学角度入手,多年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心、性、理、气是宋明新儒学的重要概念,而张载关学又独具一格,所以我们常常能看到的关于张载以及关学的研究都是围绕这些哲学概念展开的,但对于他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学者却多是几笔带过或者置而不论。从学术分类的观点来看,这一处理方式毋宁是正常的,但同时也有另一种片面化的危险已经或隐或显的浮现出来——这便是余英时先生提到的“理学的哲学化”危机^①。然而,包括张载在内的宋代新儒家,并不是仅仅关心心、性、理、气的形而上层面,他们同时承续了儒家大传统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使命。这种儒家思想中的“同心圆”模式让他们热切地期盼着能将毕生所学报效于国家、实践于社会。从这一点上看,先前的“学”与后来的“政”必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自然开启了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对话。本论题从研究政治思想的角度出发,绝不是想以“政治”替代“哲学”,而是试图构建“学”、“政”映射的环境,进而全面勾画人物的思想地图。

另外,迄今学界多偏重于对张载思想内在性的解构,在进一步挖掘其思想形成的外在动力方面仍然欠缺。事实上,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需要考虑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的逻辑关系。思想家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相互影响,才构成了他的

^① 笔者注:关于这一点,余英时先生曾指出:“近百年来,理学的研究,无论采用西方何种哲学观点,在这一方面的成绩都是很显著的。但是理学的‘哲学化’也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即使它的形上思维与理学整体分了家,更和儒学大传统脱了钩。”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北京: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思想灵魂。相对哲学世界的“内圣”来说,张载的政治思想就是“外”;相对张载自身的学术框架来说,他与其他士人的学术交往就是“外”;而相对北宋士大夫的学术潮流来说,民间百姓的文明伦理生活就是“外”。由外而内“剥洋葱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思想家的理论构架;反过来,由内而外的拓展性观察,也能折射当时历史时期百姓生活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一个人物或是一个时代的思想都大有裨益。

从这两方面来看,研究张载的政治思想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无论是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还是思想理论的形成方式,我们都有必要展开关于张载的政治思想研究,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张载研究的完整性,同时也关系到针对北宋时期政治与文化的伴生关系。丁为祥在《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一书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尝试通过政治与文化的互动,重新阐释张载的哲学体系:

在以往的张载研究中,人们从程朱陆王出发对张载以流定源,从而形成种种偏取;或者以西学为基本坐标对张载进行种种诠释,但恰恰忽视了汉唐佛老炽传与儒学不振这一推动着张载“造道”的具体而真切的历史因缘,这也是张载哲学性质长期以来聚讼不已的真正原因。所以,笔者(丁为祥)强调从理学崛起的思潮背景与张载探索的问题意识出发,就是强调从张载时代的理学思潮及其具体的文化感受出发去把握其哲学、理解其体系。在笔者看来,这无疑是一条更能接近张载之所思的途径。^①

同样,在对张载政治思想研究的过程中,也需要这一角度的重构。因为就张载本身而言,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是其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更是他毕生治学的动力源泉。为学,对他而言只是手段;为政,才是张载真正追求的人生目标。从这一角度来讲,若对张载的关学研究只停留在心、性、理、气的形而上层面,无疑是不完整的,至少是不立体的。国家的孱弱、佛老的影响,以及王安石变法所带来的种种变化,都深刻地影响着张载对学界、政界的思考。所以,不仅他构建的哲学体系是有针对性的,政治体系也同样是有针对性的。若只看到他借鉴了《周礼》中的井田、宗法和封建模型就将其界定为“抄袭古人、流于空谈”,恐怕有失公允。北宋社会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间互动的产物,也代表了宋

^①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代士大夫阶层鲜明的政治取向和行动风格,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政治学的考察视角入手,正是希望能在这一方面尽些自己的绵薄之力。

二、理论意义:探究儒家政治理念在历史中的流变

作为具有入世性格的理论学说,儒家在治国方略方面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构架。本论题所涉及的“三代之治”、“公、私”概念、民本思想等政治理念,都是其中极具儒家特色的典型代表。然而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这些理念并非都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它们都被统摄在儒家思想的语境之内,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它们的含义和内容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差别。而本文对于张载政治思想的研究,将会从一个侧面对这些政治理念的历史流变展开探讨。这样的研究路径不仅能为我们展示一个生动的理念演变过程,更重要的是,它也将十分有利于推动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理论之间的对话,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研究儒家治国方略的历史流变,是本文逻辑演进的重要维度,在此我们以“三代之治”为例试以说明。

回顾中国儒家的基本政治目标和原则,无外乎是有德者有位、立君为民、不私其位的“王道政治”,从而建立起一个天下“归仁”、“为民”的道德理想国,尧、舜、禹的“三代”盛世恰是这样的典范,他们所运用的“井田、封建、宗法”更是“王道”治国的经典制度。因此,“三代之治”一直是儒家思想人物心中的向往。然而,当时间推移至张载所处的北宋,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早已物是人非,“井田、封建、宗法”已经难以回复,难道“三代之治”就只能成为镜花水月了吗?面对这样的挑战,张载构建出自己的一套政治蓝图,他虽然依旧以“井田、封建、宗法”为核心制度,但在制度的解释上及其推行方法上,都做了重新的规划和适度的调整。除此,他还创造了一些配合“井田、封建、宗法”的辅助性措施,譬如“以地换权”、“选贤与能”等。不论它们是否能够帮助赵宋王朝回复到“三代”的辉煌,依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张载在继承延续“三代之治”核心理念的同时,对“三代之治”的具体内涵已进行了创新,这里的“井田、封建、宗法”已和尧、舜、禹时代的不完全相同了。这已经是儒家政治理念的一次历史流变。

而当研究继续推进时,我们发现在张载政治思想的传承过程中,“三代之治”的形式又出现了变化。张载作古之后,他的弟子吕大临将老师思想中的核心部分提炼出来,写成《蓝田吕氏乡约》并且付诸实践;随后朱熹将其发展,以“乡约、社仓”等形式进行尝试;到明成祖朱棣时,“乡约”已被纳入官方正式的

行政机构,并在王阳明时期盛极一时;甚至近代梁漱溟先生也曾依据“乡约”提出过“地方自治”的蓝本,并且验于一方。在这些变革中,张载的“井田、封建、宗法”化身为“乡约、社仓、社学、保甲”一系列地方自治制度,并发挥了启发民心、提升责任等效应。从一定程度上,“三代之治”的精神依然得以延续——以文化人的“王道”政治,但在制度实体上,却已经发生了变形。

由此不难看出,儒家的政治思想虽然成形于几千年前,但与博物馆里的考古发现并不相同,它的思想是鲜活的,是生动的,是能与不同的时代产生对话的。尽管远古的“三代之治”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儒家坚守的价值核心不会就此埋没,其思想的连续性往往就表现在历史的不断解释和实践中,从而悄无声息地绵延下来,那些所谓“来世的”思想其实只不过是“今世的”再现,这便是思想的传承。分析这一系列的思想脉络演变,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在今天重新理解儒家的价值,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让它适应变化而历久弥新。

与此同时,探究儒家政治理念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与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异同。本文论及的“公、私”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儒家的治国方略是两条不同的通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是 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它的核心议题是“公、私关系”^①。但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公”、“私”概念就存在着差异:西方的公与私是两个相切的圆;而儒家的公与私是两个同心圆,因为在儒家社会里,行政管理长时间地依存于家庭这个基本单位。正如 Henry Rosemont 教授所分析的:

……甚至儒教社会中的政府机构都像是家庭的扩大,这可能也是最低一级的政府官员被称为“父母官”的原因……在儒家概念里,“我”并不是一个自由、自治的个体;除了我本身之外,我更是一个儿子、丈夫、父亲、朋友、老师、学生、邻居、同事等等。并且,我以这些角色为生存方式(living),而不仅是“扮演”(playing)这么简单。^②

① 笔者注:此观点参见 Richard Madsen: *Confucian Conceptions of Civil Society*, Daniel Bell ed., *Confucian Political Ethic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

② Henry Rosemont: *Civil Society, Government and Confucianism: A Commentary*, in Daniel Bell ed., *Confucian Political Ethic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7.

这些儒家伦理关系直接反映在了张载的政治思想当中。他所勾画出的政治蓝图正是对伦理观念的外在实践：“井田”是从经济角度处理公私关系；“宗法”是在家族内部、风俗文化上加强“私”对“公”的责任感；而“封建”则是将家庭伦理扩大到政治制度的层面，形成“家国天下”的政治结构。张载的思路是儒家治国方略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在处理公私关系的时候，没有像西方理论那般将“公、私”分离，而是将“公、私”融合在一起，以家为国，以国为家。在政治体制被“伦理化”之后，公共道德观与家庭价值观合二为一，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个人与他人间的互助，也因为血亲的连系而变得更加突出。这些都可能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产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起到平衡作用。所以，解构张载，反观当下，将有助于我们研究儒家思想能为政治领域带来哪些正面或者负面的元素，对我们今天的现代民主政治生活有何启发。

三、现实意义：对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提供借鉴

如果说上述的意义仅局限在政治学的视阈之内，那么还应当指出的是本论题对于“大文化”的讨论也具有意义。三十年前克虏伯（A. L. Krober）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两位人类学家便检讨了一百六十多个关于“文化”的界说。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个看法同时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因此曾在社会科学家之间获得广泛的流行。^①

当时光流转来到全球化的今天，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受到外来的挑战。在五光十色、日新月异的生活里，我们不禁要问，还有没有位置留给传统？还是将它束之高阁，放入精美的博古架上以供参观？对此，唐君毅先生在几十年前就阐明了“保守”的意义：

人类固然要求进步，但求进步，只依于我们觉到一理想为真正有价值，因而以之改变现实。求进步而不根于理想，只是求变迁、务新奇、失根本、离故常，此并非真进步，因而不表现价值，而只是轻薄。……人要有新理

^① 笔者注：参见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想,要先有其价值之自觉。人如能真知灼见旧日之文化无价值,人当然亦可以改变。^①

唐先生所讲的价值,即是传统留下的文化核心,它就像航行中的指南针,不仅不会阻碍我们前行,而且能让我们走得更稳、更远。伴随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否定,许多传统的思想观念也被随之否定,东方如是,西方亦如是。当现代人在面临各种压力之时,既无田园可归,也无家庭可守,工作与生活的空间漂移使人们成为冷漠的动物,个体生命,甚至整个社会似乎抛去了历史的重担,却又遭遇了归属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传统断裂不仅不会一身轻松地迈进现代民主的天堂,反而可能从历史发展脉络之中游离出去而迷失了自我。

张载本人极其重视传统,他的政治思想都是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再根据现实问题进行调整和修正的。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载被冠以“迂腐”之名,但是在细致地剖析了来龙去脉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中也存在很多积极的元素。例如前文提到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典型思想“民本思想”,经过张载的诠释体现出诸多进步的方面。“张载民本观”将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俯视视角”进行了下移,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一系列执政阶层与人民群众更为亲近、更不功利的对话,民心自觉被逐步地唤醒,参政意识不断加强,具有对“民”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双重并重的特征,对当下的“以人为本”亦有借鉴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传统的思想不仅不能够被时代抛弃,而且是孕育时代新思想、新观念的肥沃土壤。如果说我们研究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些即将被遗忘的事,而是在诠释中尝试掌握构建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来的资源,那么对于张载政治思想的解构,也同时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帮助我们确定传统与现代的认同关系,确定民族自我的文化价值观念,在新的时代中将传统继承并发展。

第三节 文献综述

如上文提及,关于张载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哲学领域,政治思想方面的探讨还相对薄弱。虽说薄弱,却也不是空白。就我阅读所及,诸多学者都在其论著

^①唐君毅:《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见《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32页。

中都曾谈及此题。总体来讲,各家虽有不同论调,但对于构成张载政治思想体系的三个核心要件“井田、封建、宗法”的分类方法大体是一致的,只是所持评价有所不同。在中国大陆,因为时代背景的关系,早期对张载政治思想的分析多基于唯心或者唯物、历史进步或是历史倒退的论调,直到近年才逐渐改变;在港台地区,虽然去除了以上的预设,但张载还是多以哲学家的身份出现,他的政治思想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在西方汉学界,虽然一些学者论及了张载政治思想中的可贵之处,但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

一、中国大陆对张载政治思想的研究现状

目前,大陆学者对张载政治思想的研究大部分散见于编年体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及研究张载的相关著作中,还没有学者撰写关于此论题的专著。

早期,陶希圣、吕振羽、杨幼炯先生所著的书中都是介绍性的列出张载政治思想,其评价也基本一致,认为张载是在吸收释道思想之后才形成了其独特的思想源头,“井田、封建、宗法”是张载政治思想的核心所在。

横渠之政治论,慨然有志于三代之法,而以恢复古代井田制度与立宗法为其政治思想之主要骨干。^①

而萧公权先生则进一步指出了张载政治思想中的实务倾向。他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将宋代之政治思想分为“理学”和“功利”两大派,“前者承唐代学术之余绪而光大之,后者惩国势之积弱而思振救之。二者均依傍孔氏而皆不守于秦汉师法”^②。虽然书中并未给出一节详论张载,但萧先生对其政治思想已有了判断:

张载主张复行井田封建固有其实际上的意义。井田者欲救贫富不均之失,封建者欲矫中央集权之弊。凡此皆与功利派不谋而偶合。^③

① 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32页。有关张载政治思想主干的观点,可参见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四册),中华印刷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120-122页;及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401页。

②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③ 同上,第418页。

张载由此与欧阳修、王安石、李觏、陈亮、叶适等人站在了一起,此“功利派”的特点在于“斥心性之空谈,究富强之实务”^①。

然而,此后学界并没有将萧先生对张载“斥空谈、重实务”的思路延续下去,却是受到唯心唯物论调的影响。1956年,张岱年先生《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出版问世,继而掀起了一阵研究张载及其关学的热潮,陈俊民、程宜山、姜国柱、龚杰等多位学者均出版了关于张载的专著。应该肯定的是,即便它们多围绕哲学方面论述,或带有某种理论性的预设,也依然促进了学人对张载政治思想的了解。基于这些努力,近年来政治思想史领域的著作中,关于张载的比重也有所增加,研究正在不断深入。

总体而言,学界目前对于张载政治思想的评价无外乎两类:一种是偏向否定的,另一种是偏向肯定的,而争论的原因源于学人不同的解读方式。

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张载的政治思想中虽有一定的积极因素,但仍然摆脱不了理想化的局限性。比如姜国柱在其专著《张载的哲学思想》中单辟一章讨论张载的井田制、宗法制和改良主义思想,将其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相联系,做出以下判断:

他(张载)的政治主张中,我们可以看见,其政治思想的两重性、动摇性,这正是其哲学矛盾性的表现,足见其哲学思想的矛盾性与政治思想的两重性是何等密切的联系着的。^②

而《张载评传》的作者龚杰也认为:

张载重建“封建”的设想,虽然是为了改革,但这种理论是陈腐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尽管改革的办法可能无济于事,但为了恤民,为了救失,还是应当请求试行,否则,就是没有承担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这种执着而近乎迂腐的态度,反映了当时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③

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页。

② 姜国柱:《张载的哲学思想》,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姜国柱先生是将张载的哲学思想定位于二元论的基础上的,在姜先生看来,张载的政治思想也体现这种一致性。

③ 龚杰:《张载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

葛荃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现了张载政治思想的研究已进入深入而全面的阶段。书中对于理学诸子的政策理想进行了“主题式”的梳理,分别讨论了“变革与师古、德治、仁政、刑杀、宗法、分封和井田、求贤才”六个主题,每个部分对张载的观点都有涉及。而他对张载政治思想所持的评价也比较中肯:

总体上看,理学诸子(笔者注:指张载等人)多数品行端方,对外反抗激烈,颇具民族气节。……然而,他们提出的政策方针却往往与时势相左,或抄袭古人,或流于空谈。他们对于传统政治思想的建树并非在此,而是在于对政治哲学的创建和发展。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理学思潮方能席卷两宋、元明,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后半期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①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张载及其关学学派的政治思想持赞许态度,认为张载把握住了社会症结,具有务实风范,是儒家典型的卫道士。

陈俊民是国内当代研究张载的代表人物,1978年由陈俊民先生点校的《张载集》出版,完整收录了现存的张载文献,大力推动了张载研究的学术发展。在《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一书所涉及政治话题的部分,陈俊民这样描述以张载为首的关学学者:

关学学者大都富有高尚的气节和德操,往往超脱于政治党争之外,不同腐朽势力同流共处,结果,使关学思想的鲜明政治倾向,竟蕴含在关学学者非常温和的政治态度之中。^②

而他在2001年的论文《“道学、政术”之间——论宋代道学之原型及其真精神》中就鲜明地点出关学“学政不二”的特点。文中,陈先生如此称赞张载:

在宋代道学诸子中,张载确实是一位“勇于造道”,敢于创新的哲学家,他不仅在哲学上明确提出“体用不二”的方法论原则,而且在政治上论证了

① 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433页。(笔者注:第十八章关于两宋理学,为葛荃老师主笔。)

② 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学政不二”的“帝王之道”(内圣外王之学)。^①

此外,他还语重心长地讲道:“只有整体重构宋代道学之原型,才能对它的意蕴做出合情合理的现代诠释,才可以进行‘创造性的转换’。”^②

以这种“重构”方式进行探索的还有程宜山。他在其论著《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中就注重了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重构历史。他说:

现代的系统方法,要求人们始终注重从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它具有整体性、综合性、辩证性的特点。……与以往方法不同:在于它注重从为系统的整体功能服务的角度来认识各个部分、认识系统的结构、认识各个部分的功能,并从功能最佳化的角度来对系统及各个部分做出评价。^③

据此方法,程宜山指出:

在张载看来,为政之道也是人道的一部分。人道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而为政即是养民、治民。把为政之道统摄于为人之道,亦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特点。^④

曹德本先生则较早地点明了张载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意味。他在198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述评》中就明确指出:

张载从积极的方面继承和发挥了儒家传统的民本之义,在北宋初期的历史条件下,站在中小地主的立场上,主张以民为本,注重民生,强调均平,并立

① 陈俊民:《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中国哲学及其方法论探微》,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

② 同上,第240页。

③ 程宜山:《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北京: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④ 同上,第94页。

足于改革,以“井田”为主要措施,目的是防止大地主的兼并,具有进步意义。^①

随后,他又在《儒家治国方略》和《中国传统思想探索》等多本书中论及此观点,从民本的角度挖掘张载政治思想中的积极意义。

另外,卢国龙在他的著作《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中也肯定了张载的政治思想:

张载把握住症结,说明他对(社会)问题的诊断是有见地的,其思想出发点也在于求新而非恋古,至于又转向历史去寻找药方,主张恢复井田制和封建制,则与时代背景有关,与他所能掌握的思想资料也有关。……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理由厚责古人,也没有理由按照复古或创新的简单模式来评价古人,而有必要分析其复古或创新是否切中历史现实的弊病。^②

整体而言,中国大陆对张载关学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深入,其中陕西师范大学是当今关学研究的重镇,陈俊民、林乐昌、丁为祥等多位专家都对张载进行过专题性的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借助重构“语境”(context)的研究方式,大陆对张载关学的理解还在不断加深。但美中不足的是,对于张载政治思想的研究还未能全面展开,目前依然停留在一些零散的分析上,还没有专题性的深度研究,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二、港台地区对张载政治思想的研究现状

港台学界对张载研究也有涉及,但同样是哲学领域的成果颇丰,政治思想的成果罕见。即便如此,这些材料也为笔者理解张载的治学思路和学术架构术提供了很多帮助。

能见到的较早关于张载的研究是唐君毅先生在1954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张横渠之心性论及其形上学之根据》的论文。文章的学理分析深刻细致,认为张载在人性论上所阐释的观点,对宋明理学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忽

① 曹德本:《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述评》,见其著《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笔者注:当时作者以笔名“复文”发表此文。)

② 卢国龙:《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